



《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

反抗死亡

【美】E·贝克尔 著



THE DENIAL OF DEATH THE DENIAL OF DEATH

反抗死亡

【美】E·贝克尔 著
林和生 译
陈维正 校

贵州人民出版社

DENIAL OF DEATH THE DENIAL OF DEATH

ERNEST BECKER
THE DENIAL OF DEATH

(据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分公司1975年版本译出)

反抗死亡

〔美〕E. 贝克尔 著
林和生 译
陈维正 校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6印张 320千字 2插页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7—221—00647—4/B·20 定价：4.85元

C912.4

88-190

编者的话

现当代西方学术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注重人的主体性研究。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意在寻求到人类和人类文化所依据的先存的根，由此而重识、重铸人与世界、人与社会的关系。对人的研究是从两方面入手的：一是对人的宏观研究，即着眼于整个人类社会及其各个侧面，如经济、政治、文化、历史、宗教等的研究；一是对人的微观研究，即立足于人的主体性，致力于探求人的深奥莫测的精神世界和千变万化的行为表现。

为了帮助国内学友及广大读者了解现当代西方学术研究的主潮，以便纵观全局，我们选编翻译了现当代西方著名学者对人进行微观研究的一批有代表性的著作，作为丛书出版。这些著作从各个领域的不同角度对人的本质、人格、本能、潜能、情感、价值、需要、信仰等进行了较深刻的剖析，力图揭示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的精神状态，并预测这种精神状态在未来的演变。从

0104/34

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对人的主体性研究已成为许多学科的交汇点，由此形成了哲学人类学、深层心理学、社会生物学、人类行为学等竞相争艳的纷繁格局；另一方面，这些著作在一定程度上较客观地揭示了西方社会所面临的深刻的精神危机，当然。由于作者固有的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这些著作中存在着一一些唯心主义的观点和偏见，也不可能提供解决问题的答案。这就需要我们在阅读时加以分析、鉴别，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这些著作进行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吸收其中对我们有益的成分，为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

〈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编委会

1987年5月

自然、人性以及文化的悲剧

——关于贝克尔的《反抗死亡》

如果人的价值和尊严在任何时候都属首要问题之列，那么，对普遍的人之本性以及人之处境的研究，就会始终吸引那些既有人本主义热情又挚爱哲学的人们，由此将形成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把它叫作“人学”（human science, science of man）也许是很恰当的。

“人学”的内容，自然会因人而异。在《反抗死亡》的作者贝克尔教授看来，就现代人所面临的现实的、精神的以及理论的外境而言，它应该是存在主义、精神分析以及宗教神学的综合。

E. 贝克尔（Ernest Becker, 1924—1974），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先后在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旧金山州立学院和加拿大赛门·福雷萨大学等处任教。主要著有《有意义的生与死》、《心理疗法的革命》、《恶的结构》、《身着甲冑的天使》、《逃避罪恶》、《超越异化》和《反抗死亡》等等。《反抗死亡》是他最后的。

也是他自认为最成熟的一部著作，是他“学者灵魂的安慰”。该书1973年问世，次年即获普利策奖。同年，作者便溘然长逝了。

(一)

我们知道，早在克尔恺郭尔的工作中，存在主义与宗教神学的结合，就已经达到了基本的成熟度，后来，蒂利希进一步引出了某种体系化的结果。^①在这样的背景上，对于“人学”综合来说至关重要的事情，自然是要去揭示精神分析与上述两者的融合。

· 马斯洛曾经指出：人们在心理学中叫做“正常”的东西，实际上是一般水平的心理病态；它之普遍和广泛的程度导致了我们对它的忽视；而存在主义对于本真的人及人生的研究，有助于揭示出虚假人生的病态。^②马斯洛这番话精彩地道出了精神分析与存在主义之综合的必要性；而精神分析走向宗教之必要，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

① 参见宾克莱：《理想的冲突》第四、六章，商务印书馆，1984年。

② 参见马斯洛：《存在心理学初探》第一章，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二)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反抗死亡〉从人的英雄主义冲动出发展开了全书的思路。英雄主义作为人之一一种最根本的冲动，有它自己深刻的根源，那就是死亡恐惧。死亡恐惧是人这种动物特有的意识，它决定了人的悖论本性和存在困境：人既是生理性的肉体，又是符号性的自我。前者意味着人是被造物，是蛆虫的口中食；后者却让人成为创造者，成为自然界中小小的神祇。如此彻底痛苦的二元性分裂，显然是人的精神难以承受的。为了否认甚或战胜自身的荒诞命运，人拼命利用种种社会文化规范、关系（如宗教、道德、爱、父母家庭、权威，以及思想、艺术等等），凭借它们的力量去建造“神化工程”（*causa sui project*），试图从无意识中抹去自己天生无能的事实。为了能够“正常”地行动，人压抑或转化生与死的恐惧，把人之处境的绝望真理掩盖起来，由此获取基本的自我价值感、意义感以及力量感。这就意味着，经典意义的人格，实质上是一种防御机制，是生死攸关的谎言；由于这种谎言的根本性和无意识性，经典人格又可看作一种隐秘的精神紊乱，即看作神经症。贝克尔认为，神经症是人的普遍特征，是存在的基本代价。逃避这种代价，就意味着彻底疯狂的危

险。

显然，上述框架具有基本的存在主义性质，它使贝克尔有可能摆脱弗洛伊德还原主义、生物本能主义和泛性主义的局限，将头足倒置的弗洛伊德思想颠倒过来，对精神分析若干基本理论进行重建。贝克尔重新解释了肛门性欲、俄狄浦斯情结、阉割情结等精神分析重要范畴。他指出，性的问题，刚好最典型地体现了前述存在悖论中“生理性肉体-符号性自我”的二元性分裂。性是物种角色的象征，代表着人体自身的死亡与腐朽；然而，在完全被社会文化所覆盖的存在中，性又是几乎唯一真正属于个人的领域。因而，性及其种种压抑或转化，既具有一种根本的消极和被动性质，又被普遍用作反抗死亡之英雄主义的方式，以实施个体的“神化工程”（在这其中，俄狄浦斯情结又具有最基本的意义）。大家知道，性欲理论是经典精神分析的核心，也是经典精神分析最成问题的部分。正是从这里，滥觞了对弗洛伊德的大部分批判和离异。因而，贝克尔的工作可以看作是建造一条理论保护带，以此重新肯定经典精神分析理论的基本结构。

在前述基础上，贝克尔进入了同样由弗洛伊德开创的群体心理学。他指出，个体身上生死攸关的人格谎言，在群体中将通过移情（transference）作用而转化，形成自然共发（natural symbiosis）——贝克尔称为人与人之间的符咒，即所谓不自由的联系。贝克尔认为，移情

既反映了人在生与死面前的懦弱，又体现了人对英雄主义和自我解放的冲动，即同时表明了神爱与爱欲（*Agape and Eros*）这两种孪生的本体论动机（*twin ontological motives*）：人一方面希望以充分的被造物（*creature*）意识顺应各种自然和文化力量，安全地融入他为自己选择的舒适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又希望标新立异，出类拔萃。事实上，这两种动机本来就是孪生的。因而，移情证明了人身上绝对的二元性分裂，整个地反映了人的存在主义困境。应该指出，这种弗洛伊德-贝克尔式的移情理论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思想是不同的，它强调个体的存在难题，强调个体与他人关系的悖论性质，是一条经典精神分析与存在主义交汇而成的路线（贝克尔认为弗洛伊德思想中本来就内含着这两个有机联系的部分。我们此处采用的说法，只是为了简化我们的表述）。

（三）

移情之最鲜明最极端的表现，恐怕在于爱情和艺术创造这两个领域。此两者向来被认为是最为美妙和神秘的王国，是情感生活的极地，是“最后的凭藉”。在危机四伏的现代，对现代人之爱情和艺术创造心理进行深刻的分析，将帮助我们进入问题的本质。

对于失去了上帝的现代人，罗曼蒂克的爱情，就自然而然转化为理想的神爱融合。情侣就是上帝，让我们融身其中，忘却一切生与死的痛苦和烦恼。然而事实上，对情侣的任何理想化和偶像化，并不足以掩盖尘世的缺憾与腐朽；而情侣作为这尘世中的居民，既不能拯救自身肉体，又何以超渡我们的灵魂。在另一个极端，在创造型人格特别是艺术家身上，则体现着疯狂的爱欲。艺术家把世界看作自己独特的存在难题，把创造性作品视为理想的解答，视为仅仅属于自身一人的神秘彼岸。然而，艺术家自身归根结蒂仍跻身于被造物之列，其作品终究是其被造性（creatureliness）的投射，因而，如果这作品不能在他自己和它自己之外得到证明，又何以作为理想的彼岸呢？艺术家终究是在悖论之中。

上述群体心理学以及现代人之爱情和艺术创造中所遭遇的移情难题，不仅表明人在神爱和爱欲之间如何难于保持适当的（且不说理想的）张力，更重要的是让我们看到了神经症的三个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层次：神经症首先是人的普遍特征；其次是个体对生活的独特反应形式，最终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也就是说，作为人之普遍特征的神经症范畴，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它将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程度。一般说来，在庇护所一般的传统的群体观念体系或者说广义的宗教体系走向崩溃，致使人无法有效地掩饰人之处境的历史时期，人就普遍容易表现神经症。显然，这正

是现代人的处境。

神经症之历史性层次的揭示，引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精神分析，正是在现代人类群体性精神大崩溃时期应运而生的。然而，由于上述历史性层次的存在，精神分析却并不能提供真正有效的治疗。因为尽管精神分析可以对神经症的个体层次产生作用，它却无法填补群体性的广义宗教观念体系之历史性崩溃所留下的巨大空缺。

那么，出路何在呢？在贝克尔看来，出路是唯一的，那就是重返宗教之路。由于传统的群体宗教观念体系已彻底崩溃，人们的眼光应当投向那位“精深的精神病理学理论家”、存在主义鼻祖和宗教神学家——克尔恺郭尔。此人早在近一个半世纪前就指出：人应该充分承认自己的被造性，培养在最高力量面前被动地、彻底地放弃自己的能力。这就类似于弗罗姆在谈到一神教时所叙及：“……关于上帝，人仅仅能说，上帝不是什么，也就是只能从否定的方面去认识上帝的属性，……进一步……关于上帝，什么也不要说。”^①人，只要敢于彻底放弃自己，放弃对任何解答的徒劳的努力，放弃对任何移情的依赖，最终就能“孤独地跃入信仰”，成为一名“信仰骑士”；人生真正的英雄主义和最高尊严，也就作为一种非目的的结果而得到了确立。这就意味着，

① 参见E.弗罗姆：《爱的艺术》，第79—8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信仰骑士”的宗教境界，具有神爱与爱欲的理想张力，是一种理想的精神健全。因此，综上所述，精神分析从人之人本的存在性出发，沿着曲折的道路走向宗教，完成了“人学”的综合。

(四)

但是，贝克尔并未就此结束自己的工作。从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和宗教神学的融合点，他向前迈出了新的、似乎也是可预料的一步，就“理想的健全”与弗洛伊德的生活及精神道路作出了令人深思的比较。

从“信仰骑士”的超越性眼光看来，弗洛伊德显然尚未达到宗教性的“理想健全”。他疯狂执着于自己的“神化工程”，以“魔鬼般的热情”投身于自己的“精神分析科学运动”。这表明，作为精神分析泰斗的弗洛伊德，并未通过此种分析彻底消解掉自己的“俄狄浦斯情结”，因而缺乏真正完成了分析的人所应有的被造物意识，最终未能达到“信仰骑士”的境界。

然而，贝克尔急转直下地指出：关于“怎样作人”，谁也无权声称他找到了真正令人满意的解答。的确，克尔恺郭尔以无与伦比的才能描绘了“信仰骑士”的理想，但是，实现这种理想，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信仰是一种神典。在生活的生与死的游戏里，除非奇迹，

没有人能够获得这种神典。克尔恺郭尔放弃自身的“神化工程”而远离生活，这部分是因为他在生活中所遭遇的失败，以及他对生活的恐惧。相反，弗洛伊德执着于自身的爱欲和禀赋，也同样是历史与生活的必然。如果要弗洛伊德放弃他疯狂的热情和“神化工程”而去作一位圣人，那么，谁来发起和领导这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精神分析科学革命”呢？

这一切实际上意味着，使人“疯狂”或“病患”的压抑，是不可能彻底消除的。如果真有所谓“理想的健全”，那只能是一个需要亲身经历的、既无终结又不可省略的过程。把这一思想从克尔恺郭尔推而广之，就会看出：各种神秘主义以及马尔库塞、布朗（N.O. Brown）之流的“无压抑”乌托邦，实质上是一些幼稚的神话；马斯洛所谓“完全的人性”、“人的自我实现”、高峰经验的“狂喜”等等许诺，同样难免显得苍白；甚至弗罗姆，也让人感到象是一位拉比^①。的确，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这个世界多少年来年的发展，并未证明它自己具有什么预定而神圣的目的。在这个世界之自然和文化创造的恶梦中，在自然的符咒和人与人的符咒中，人们从来就流着冷汗，遭受着种种与生俱来的或不可逆料的痛苦。只是，太阳分散着我们的注意，总是蒸干血泊，让万物生长；用它的温暖散发希望，让有机体能作舒

① 拉比，犹太教牧师。

适的扩张。正如晚年的弗洛伊德所看出（在这一根本之点上，弗洛伊德的许多弟子或叛逆都未曾超过他们的老师）：现实生活是压倒一切的；这个世界的恶不仅在我们内部，也在我们外部，在自然本身。面对这样一个世界，唯一的出路，是科学与宗教的融合。它们正好是由弗洛伊德和克尔恺郭尔所代表的事业。^①

（五）

从另一个方面说，《反抗死亡》是对弗洛伊德主义与后弗洛伊德主义的综合。我们看到，弗洛伊德实际上具有一种悲观而清醒的理性主义，拥有一种相当深刻的存在主义框架，在后期工作中甚至达到了高度的成熟。但总的说来，弗洛伊德倾向于强调人的自然处境和天生的动物本能，试图仅仅据此说明人的行为，置社会环境于不顾，而把文明文化看作本能压抑的产物。后弗洛伊德主义则认为，人的行为宁可说是由文明文化诸因素所决定的。因此，后弗洛伊德主义者转而考察生活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个体。他们并不完全否认人的天性，但总的说来多少有失于环境论的简单化倾向。《反抗死亡》克服了两者的片面性。贝克尔对死亡恐惧、对人的存在主义

^① 显然，此处以及本文中其他处（亦即原书中）的“科学”概念，与当代科学哲学中的“科学”概念是不同的。

困境及其孪生本体论动机的证明和表述，特别是对神经症之人本性、个体性和历史性三个层次的概括，让人看到弗洛伊德主义经过后弗洛伊德主义再重返自身的转变。这是对弗洛伊德之后心理学的一个总结。

(六)

从根本上说来，弗洛伊德与克尔恺郭尔一样，是人之处境的天才研究者。他拥有比马斯洛这样的人所拥有的更为深刻和优越的存在主义框架。另一方面，克尔恺郭尔则是伟大的后期弗洛伊德主义者。他生活在19世纪中叶以前，却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表明了宗教和精神病学范畴的融合。心理学与宗教，或者说弗洛伊德与克尔恺郭尔，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到了科学无神论者弗洛伊德，我们才有可能明白神学家克尔恺郭尔的意义；反过来，在克尔恺郭尔的早期工作得到正确理解和评价之前，弗洛伊德就还得等待。不过，这种等待一旦有了结果，双方都会获得高度当代性的意义。也就是说，弗洛伊德与克尔恺郭尔是互为补充的。这一认识有着深刻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因为，在今天许多人看来，弗洛伊德已经成了一位仅仅是“在历史上有意义”的人物。

结束弗洛伊德对克尔恺郭尔之等待者，是精神分析运动的一位复杂人物——奥托·兰克（Otto Rank）。

这是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贝克尔认为他具有“超乎一切赞美之上”的天才。贝克尔认为，兰克那些晦涩而“高度发散性”的著作，为弗洛伊德与克尔恺郭尔的融合，或者说为精神分析与宗教的融合奠定了基础。正是兰克，对现代人的爱情和艺术创造心理作了深刻的精神分析，并创造性地揭示了神经症的历史性层次。贝克尔认为，他自己仅仅是“译介”了兰克的思想，目的在于把读者直接引向兰克的著作。因而，在《反抗死亡》一系列复杂的人物和思想中，兰克的地位与份量自然是极为突出的。

(七)

综观《反抗死亡》全书，可以感到一种强烈的悲剧气氛。在这下面，潜在着一种泛进化论的倾向。尽管作者引入了（弗洛伊德式的）“科学”因素，仍然未能冲淡或掩盖这一倾向。它使作者过分强调自然本身的“恶”，强调进化张力中无序的一面：人是进化过程中的被造物；意识和精神的出现，并未改变他被造物的命运，却徒然使他陷于存在的悖论，深受二元性分裂的痛苦。在贝克尔看来，文化不过是人与自然签订的协议，使得对荒诞与痛苦的压抑或转化成为可能。这样，在《反抗死亡》中，我们不大看得到文化创造之积极的本体论意义。自古希腊以来，不同学派的学者们，曾以